

# 地方依恋视角下乡村社区营建的内涵、机制与实施策略研究\*

## Research on the Connotation, Mechanism and Implementation Strategy of Rural Community Construc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Place Attachment

丁蔚 崔东旭 崔恒瑞 韩欣宇 DING Wei, CUI Dongxu, CUI Hengrui, HAN Xinyu

**摘要** 现阶段,我国乡村现代化转型不断引发社会经济与空间功能的重构,社区营建已成为消解集体社会解构危机、建构内生发展机制的重要路径。因此,引入地方依恋理论,建构乡村社区主体参与营建实践的情感分析视角,厘清人地互动下乡村社区主体依恋情感的形成机制及其对空间营建行为的影响。进而,阐释情感范畴下乡村社区营建的理论内涵,归纳情感作用下营建实践的尺度差异性、层级多样性和动态循环性特征,借助“情感—行为”主线建构乡村社区营建的驱动模型,分析社区主体营建行为与情感变化之间的互馈机理。基于此,从重塑空间“地方性”、整合多尺度发展条件、利用共识共建行动网络和借助空间标绘提升实践效能等方面,进一步提出社区营建的优化策略与路径,以期引导人地关系良性互动,凝聚和重塑乡村社区共同体。

**Abstract** At this stage, the transformation of rural modernization in China has constantly led to the reconstruction of social economy and spatial function. Community construction has become an important path to resolve the crisis of deconstruction of collective society and to construct the endogenous development mechanism. Therefore, this paper introduces the theory of place attachment, constructs the emotional analysis perspective of rural community subjects' participation in construction practice, and clarifies the formation mechanism of attachment emotion of rural community subjects in people-place interaction and its influence on spatial construction behavior. Then, based on the theory, this paper explains the connotation of attachment emotion of rural community construction, and summarizes the characteristics of scale difference, level diversity and dynamic circulation of construction practice under the influence of emotion. Also, according to the mainline of "emotion-behavior", this paper constructs the driving model of rural community construction, and analyzes the mutual feedback mechanism between the construction behavior and emotion change of community subjects. Based on this, from the aspects of reshaping spatial "locality", integrating multi-scale development conditions, using consensus to build the action network, and using spatial mapping to enhance practical effectiveness, the paper further proposes the optimization strategies and paths of community construction, in order to guide the positive interaction of people-place relationship, and cohere and reshape the rural community.

**关键词** 地方依恋;乡村社区;营建;机制;策略

**Key words** place attachment; rural community; construction; mechanism; strategy

文章编号 1673-8985 (2024) 02-0146-08 中图分类号 TU981 文献标志码 A

DOI 10.11982/j.supr.20240220

### 作者简介

丁蔚

山东建筑大学建筑城规学院 硕士

北京清华同衡规划设计研究院长三角分院 规划师

崔东旭

山东建筑大学建筑城规学院

教授,博士生导师

崔恒瑞

山东建筑大学建筑城规学院

韩欣宇 (通信作者)

山东建筑大学建筑城规学院

讲师,博士,24097@sdjzu.edu.cn

### 0 引言

受全球化、城市化、工业化和信息化影响,城乡之间社会经济要素的相互作用与重组加剧,广大乡村普遍经历“现代性”的结构转型,遭遇“地方性”解构危机<sup>[1]</sup>。20世纪80年代以来,西方学界开始围绕郊区化和逆

\*基金项目:“十三五”国家重点研发计划课题“村镇社区分类识别评价与空间优化技术”(编号2019YFD1100801);山东省自然科学基金青年项目“后脱贫时代基于人地耦合的残疾人公共服务供给测度方法与设施均等化规划研究”(编号ZR2023QE242)资助。

城市化现象,思考如何在乡村发展过程中重塑地域的空间价值与地方意义,并针对生产性功能消解问题提出了“后生产主义”(post-productivism)和“多功能”(multifunction)等转型取向。在此背景下,社区主体在活化地域资源、改善生活环境、激发社区活力中的作用受到重视,相关国家推动了西方“社区复兴”、日本“造町运动”和韩国“新村运动”等地方性重塑实践,缓解城乡失衡与乡村发展不充分问题,恢复人地和谐关系和情感认同,最终凝聚社区共同体,促进乡村可持续发展。

进入21世纪以来,我国日益重视城乡发展失衡和“三农问题”,先后实施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美丽乡村等建设行动。但早期实践普遍强调物质空间建设和生活条件改善,一定程度忽视了村民主体性和参与度,导致集体社会解构、社区内聚力缺失。2018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乡村振兴,治理有效是基础”,反思外部主导模式的局限性,村民及相关组织在现代协同治理、社会活力建构中的地位愈发重要<sup>[2]</sup>。其实,我国乡村始终根植于传统的宗族关系和“熟人社会”,后期土地集体所有、村民自治管理的行政组织框架进一步巩固了以地缘、血缘为纽带的地域性社区特征。强烈的传统宗族观念、“熟人社会”建构的信任关系和日常组织生活催生的集体认同,不断强化社区成员的共同体意识,奠定了地方性营建和现代治理的情感基底。因此,革新过分强调物质空间更新与功能开发的营建模式,倡导重塑乡村主体地位和社区共同体意识,发挥地方情感的激励作用,培育乡村现代化转型内生动力,探索适应本土永续发展的实施路径,意义重大且具体可行。

## 1 依恋情感的建构机制与影响

### 1.1 人地互动下依恋情感的建构机制

最初受人文主义浪潮影响,西方学者日渐关注微观个体与地方之间的内在关联,重视地方情感对塑造物质空间的驱动作用。20世纪70年代,地理学家段义孚率先将主体对特定空间的感知、态度和价值观,归纳为“恋地

情结”(topophilia)<sup>[3]</sup>。随后,地方依恋(place attachment)概念被提出,建构了“人们与居住地之间情感联结”的基本内涵<sup>[4]</sup>。相较于单纯的物质空间,“地方”侧重表达其承载的社会文化和心理感知<sup>[5]</sup>;“依恋”则借鉴心理学观点,强调个体亲近好感对象的生物本能<sup>[6]</sup>。后续研究中,地方依恋及其相关概念的内涵与关系逐渐明晰<sup>[7][273,18]</sup>,建构了包括地方依赖(place dependence)与地方认同(place identity)的二维理论框架<sup>[9]</sup>,进一步指出,地方环境的物质支持促生的功能性依赖<sup>[10]</sup>是依恋情感的建构基础,主观感知、价值取向和行为选择等复合而成的情感认同<sup>[11]</sup>则集中体现主体对地方的归属感和认同感。虽然地方依赖与地方认同共同构建了地方依恋的内涵,但会因其客观差异形成不同的构成比例<sup>[12]</sup>。

此后,诸多学者以“依赖—认同”二维框架为逻辑基础,实证研究主体与定居地<sup>[13][17]</sup>、旅游地<sup>[14][25]</sup>、第二居所<sup>[15]</sup>和公共场所<sup>[16]</sup>的情感结构和形成机理。并在关注物质空间向“地方”转化的过程中,逐渐形成“情感—行为”认知框架。借鉴人地互动视角,西蒙<sup>[17]</sup>提出聚焦主体空间行为的“地方芭蕾”(place ballet)理论,认为特定时空规律(time-space routines)下重复性的“身体芭蕾”(body ballet)将赋予载体空间特殊的依附情感,即主体长期、反复的实践活动,使得关联场所超越原功能属性,成为“有意义的停留点”。斯坎内<sup>[18]</sup>则剖析由人类主体(个体、群体)与客体场所(社会环境、物理环境)互动引发的认知、情感和行为等心理过程,建构了较为全面的三维机制框架。后续研究进一步揭示了主客体之间的良性互动,不仅能有效引导主体积极的地方认知和行为倾向,亦能够推动其依恋情感的萌发与延续<sup>[19][18]</sup>。

### 1.2 地方依恋对社区营建的影响

在具体的社区营建活动中,依恋情感主要借助依赖与认同心理,影响主体参与社区发展的意愿与行为。相关研究表明,受自身属性特征与感知差异的影响,人们会对社区形成不

同程度的依恋情感,从而与密切相关空间做出主动亲近、拒绝撤离等选择,甚至在更换居住地后采取定期回访<sup>[20]</sup>、远程互动<sup>[21]</sup>等方式保持情感联系。积极正向的情感累积与实践体验有益于提升社区主体的责任意识,激励其主动提升居住环境品质和抵制不利影响项目,自发维护社区的既有价值与长期利益<sup>[22]</sup>。因此,社区营建应充分考虑主体的内在属性与情感状态,合理引导依恋情感以激发积极营建行为,有效避免可能出现的消极态度和倦怠行为<sup>[23]</sup>。

至于影响社区地方依恋产生与发展的外部因素,大致可分为物质环境因素与社会组织因素两方面。其中,物质环境因素涉及居住空间<sup>[24]</sup>、公共空间<sup>[25][34]</sup>、设施配套<sup>[26][34]</sup>、绿化景观<sup>[27][1240]</sup>等要素,直接影响成员对生活舒适性、便利性和服务性等方面评价的同时,引发其满意度、归属感等情感变化。社会组织因素主要由个体特征引发主观感知与功能需求的差异,间接影响依恋情感的形成与存续。研究表明,年龄<sup>[19][12]</sup>、性别<sup>[7][278]</sup>、受教育程度等人口属性特征,显著影响个体的社会交往与社区认知,导致不同人群与物质空间的情感联系差异。家庭传承、集体记忆等无形社会资本<sup>[28]</sup>,则建立跨时空的社会联系与意义感知,发挥维系依恋情感的关键作用。其中,当下剧烈的城乡流动作用不仅未割裂村民与成长环境的情感纽带,反而可巩固农村人的“定居身份”(settlement identity)意识,促进资源回流和反哺乡村<sup>[29]</sup>。

综上所述,国外有关地方依恋的研究开展较早,且形成了相对系统的研究成果。在理论层面,明晰了人地互动中依恋情感的内涵维度与形成机制,同时基于“情感—行为”视角广泛讨论不同因素对依恋情感的形成发展,及其驱动主体参与营建活动的差异作用。相较而言,国内学者主要结合乡村旅游<sup>[14][23]</sup>、旧城更新<sup>[30]</sup>和社区参与<sup>[31]</sup>等议题,探究物质空间及其承载的非物质要素对乡村地方依恋培育的作用过程,揭示主观情感对空间环境感知、地域价值识别、活动参与意愿的具体影响,即情感驱动与行为反馈的互动机制。但既

有研究主要是借鉴国外理论与方法开展的实证分析,缺乏立足我国城乡发展与入地关系演进的阶段特征,无法形成本土化的理论思考与路径探索。因此,本文从主体的地方情感视角出发,通过建构乡村社区地方依恋的理论内涵与分析框架,探究情感驱动下社区营建的主体参与机制,并针对性地提出适应乡村社区地方情感培育与内生动力建构的营建策略,以期响应乡村可持续发展与社区化转型的时代背景,为地域入地关系的良性发展提供有益思考与建议。

## 2 依恋视角下乡村社区营建的内涵

社会学领域将“社区”定义为一定地域范围内,以地缘、血缘或业缘为联结纽带的利益关联共同体<sup>[32]</sup>。社区成员拥有的共同体意识,即共同的文化理念与价值趋向,将不断形塑社区的物质空间,创造独特的乡村人居环境。作为入地之间深层次的情感联结<sup>[7]274</sup>,地方依恋集合了主体对地方的情感态度和价值观念,构成了重塑社区成员共同体意识的心理内核。地方依恋导向下的乡村社区营建实践,将有助于形成以“地方”利益为核心的价值观念和判断标准,进而规范和引导相对独立的主体行为。最终,凭借积极实践凝聚共同意识,

构筑超越一般利益关系的社区共同体。

作为驱动行为选择的关键要素,情感本身具备了跨越性、层级性和不确定性特征<sup>[33]</sup>。同样,依恋情感在作用于社区营建活动时,也会呈现出尺度差异性、层级多样性和动态循环性特征。

### 2.1 尺度差异性

乡村社区依恋情感的空间效用并不局限于场所内部,会从社区延展至地区、城乡等广阔地域,形成具有尺度差异的社区归属、地方认同和乡土情结等情感形式(见图1)。而且个体层面依恋情感呈现的并存交叉特性,将实现现代化进程中群体意识的时空叠合,建构以“家”为原点的同心外延结构。

首先,乡村社区作为基本空间单元,不仅是生产生活的载体空间,更是具有情感价值的意义场所。在社区成员的日常体验中,其与社区间的直接联系不断建构社区信任,最终通过“在场”互动培育了“家”的心理归属。社区归属作为微观尺度的情感表征,则持续巩固成员对日常生活空间的功能依赖,推动其参与必要的社区营建活动。

其次,由于乡村是融合了自然与人文要素的综合性地域,社区成员与地方的互动过程

将超越具体的实践活动与实体空间,形成对泛乡村地区的集体记忆和价值认知<sup>[34]2391</sup>。这种普适性的“整体性”感知,会有效塑造成员“本地人”的身份认同,增强其对营建活动社会建构意义的理解,激励其投身于创造与延续地方性空间。至于上述“自我”实现的场所可以“不完全在场”的方式,借助社会记忆纽带促成群体情感与实体要素的密切关联。例如周期性开展的民俗节庆、祭祖扫墓、返乡务农等活动,都是地方认同心理下社区成员参与营建活动和彰显“自我”身份的重要方式。

至于宏观城乡尺度,虽然“缺场”的外部主体难以与社区发生直接互动,但其对自然田园生活的向往,让“符号化”的乡村图景与想象打破了时空阻隔的限制。在完全分离的互动过程中,长期实践形成的耕田水渠、老街民居、祠堂古树等物质要素,以及生活氛围、生产技艺等非物质遗产,都会激发乡土情结和异地想象,建构主体返乡与资源回流的情感动机。

### 2.2 层级多样性

借鉴既有研究归纳的地方情感层级结构<sup>[35]</sup>,进一步将依恋情感细分为依赖感、认同感和根植感3个层级(见图2)。在依恋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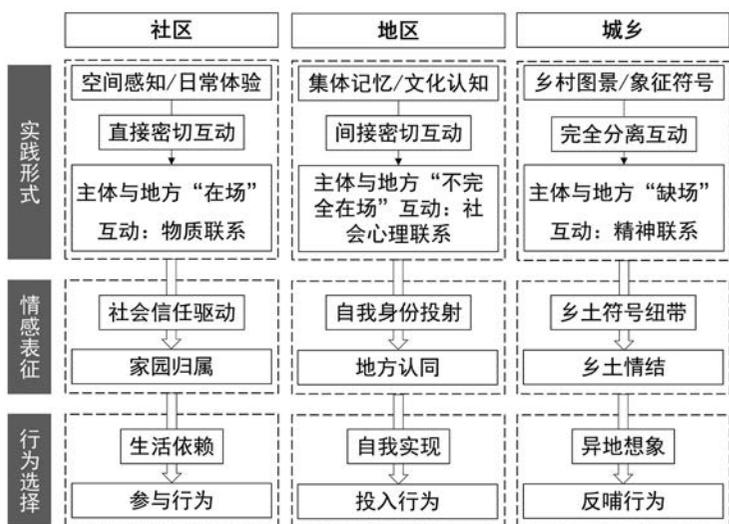


图1 尺度差异下乡村社区地方依恋的特征  
Fig.1 Characteristics of place attachment in rural communities under scale differences

资料来源:笔者自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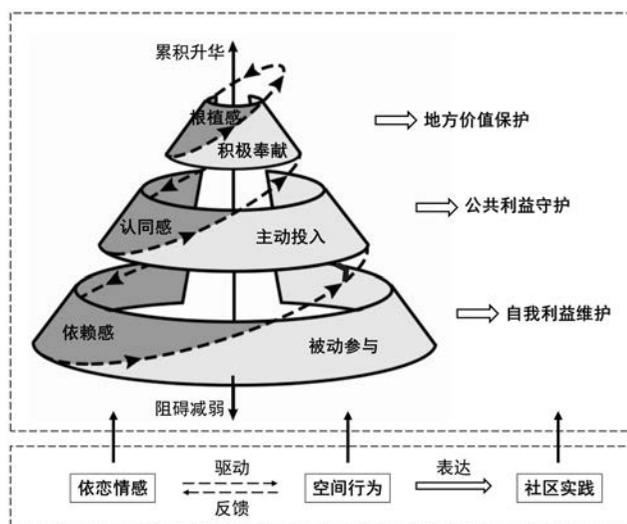


图2 依恋情感下乡村社区营建的层次性与动态性特征  
Fig.2 Hierarchical and dynamic characteristics of rural community construction under attachment emotion

资料来源:笔者自绘。

感建构之初,生存理性迫使成员接受地方的生计支持,形成对社区空间功能的基本依赖,至少为了维护自身既得利益,会被动参与社区营建。伴随着周期性的日常实践,不断增强的稳定安全感将促成物质空间的意义叠写,社区将转化和融入成员的生命历程。地方意义下社区空间则成为社会存在与身份象征的载体,身份认同驱使成员谋求社区的长远发展,主动投入各项营建活动。最终,社区成员将在精神层面建构更高层级的根植感,主体自我利益与需求则被进一步弱化,甚至为保护地方价值而自愿做出牺牲与奉献。

值得注意的是,虽然社区成员的依恋情感由多层次的情感内容按照不同比例融合而成,不存在严格的区别界限,但较高层级的情感通常主导着情感状态与行为表现。因此,社区营建的重要目标还在于利用良好的空间实践,引导复杂情感的“同级调节”或“层级跃迁”,巩固和建构持久的内部调控机制。

### 2.3 动态循环性

上述依恋情感的层级变动现象本质上属于“情感—行为”交互下主体心理的内化反馈过程,包括累积升华或阻碍减弱两种迁移趋向。具体而言,营建活动既是建构成员地方依恋情感的实践基础与具体过程,其衍生的地方情感与行为倾向又会反向作用于各项社区实践。由于成员对社区的空间感知与主观评价存在一定差异,导致其依恋情感存在多样的层级状态与演变方向。其中,积极的情感与行为将形成螺旋递进式的促进模式,正向的情感联系不断积累甚至升华,并对后续的空间体验与营建活动起到增益作用;反之,不利的外部环境及引发的消极空间体验会造成情感的削弱或阻碍,逐步影响情感层级衰减和行为选择趋向于保守。基于此,“情感—行为”逻辑下的乡村社区营建应以空间营建为载体,以主体情感认同与地方价值保护为抓手,持续推动“情感驱动”与“行为反馈”之间的正向循环,实现社区物质空间与情感共同体的动态建构。

## 3 依恋累积中乡村社区的营建机制

### 3.1 乡村社区营建的行为主体

情感是主体的经历与表达。根据依恋情感下多元主体与社区的互动模式及其表现出的外部反哺、间接投入和直接参与等行为差异,可将社区主体进一步归纳为“缺场者”“不完全在场者”和“在场者”。不同主体因角色身份或知识能力各异,具有差异化的情感表达路径。

(1) 外部反哺的“缺场者”。包括提供行政支持、财政投入、政策扶持的地方政府,在社区化转型中承担引领作用;怀有乡土情结的外部组织机构、企业和个人,可在利益驱动或认同激励下提供发展资源,如乡村规划师可发挥专业优势,为乡村建设提供技术支持。

(2) 间接投入的“不完全在场者”。主要指长期在外生活的流动人群,他们通常以“事件”为契机规律性返乡并进行现场实践,以维系对家乡的情感;无论是在城市立足的“精英阶层”,还是往返城乡的务工求学人员,都可作为社区获取外部资源的重要渠道。

(3) 直接参与的“在场者”。社区成员是切身感知营建过程的直接相关人,主要凭借组织机构或少数权威人士发挥关键主体作用。其中,乡村基层党组织是乡村建设发展的领导核心,将以先进性思想与组织化行动,领衔乡村发展和维护农民利益;乡村自治组织为资源整合提供中介平台,如村委会通过宣扬共同价值理念以协调各界力量;普通成员则会立足共同发展诉求汇聚民间力量,自主组建宗族组织、经济合作社等“小型共同体”。另外,乡村社会中部分权力、资本或知识的赋能人群,同样具有强大的征召动员能力,如村干部作为权力与利益的汇集点,在发挥积极角色作用时将增强村民的制度信任;乡贤精英可凭借多元资本支撑,成为探索示范产业发展或守护本土文化的重要力量。

### 3.2 乡村社区营建的影响因素

乡村社区营建是以社会经济发展为基础、以物质空间为直接载体开展的实践活动,

其影响因素包括经济、社会、空间3个维度。上述因素以支撑、推动或阻碍等方式共同作用于主体与社区的互动过程,并对社区营建产生不同程度的影响。

(1) 经济资源的供给与配置是功能依赖的建构基础。其中,宅基地、耕地等土地资源的产权稳定可以提升村民的安全心理,影响择居、迁移等行为;预期收入增加将直接激励主体参与社区营建,并在利益诱导作用下主动维护村庄健康发展<sup>[14]32</sup>。

(2) 社会资本条件与组织特征是整合资源、动员主体和支撑情感正向累积的关键。其中,惠农惠商政策能有效提高社区对土地、资本、设施等要素的利用水平,提升成员的满意度与认同感<sup>[36]</sup>;乡愁思潮有利于激发现代社会的乡土情结,外界认同则进一步恢复村民的自豪感和建设热情<sup>[14]33</sup>;剧烈的城乡流动一定程度上强化了“乡村人”的身份认同,将在乡村营建中发挥维系公众参与的本源作用。

(3) 空间场所与物质环境是存续地方依恋的物质载体与历史线索。其中,具有地域特色的自然环境是地方依恋的原始吸引力<sup>[27]1241</sup>,也是形成与维系依恋情感的重要本底;完善的设施配套与服务供给将支持与保障社区的功能需求、稳固基本的社区依赖<sup>[26]34</sup>;而具体的耕田水渠、老街民居、祠堂古树等物质文化要素则通过直接呈现社区历史发展印记,促进空间感知的积极反馈与正向评价,甚至突破时空限制成为维系乡土情结的符号纽带<sup>[25]33, [34]2386</sup>。

### 3.3 乡村社区营建的情感驱动机制

如图3所示,受多元因素影响,社区成员与其日常实践空间建立了不同的时空关系、形成了各异的行为特征,使主体具备了多尺度、多层次的依恋情感。其中,作为社区营建的主要决策者与执行者,“在场者”通过长期的空间实践与社区建立了直接密切的物质联系和本底情感,促使成员出于生活保障目的,利用其身份附属的社区信任,探索社区发展的有效路径。而根据主体与社区的互动模式进

一步划分出的“不完全在场者”和“缺场者”，均对外部资源要素的引入起到重要作用。二者差异之处在于，前者依靠地方认同维系与社区的情感联系，驱动其发挥城乡两栖流动的优势条件，辅助支持社区营建；后者借助乡土图景想象的方式，破除主体与社区的时空阻隔，实现人地情感异地联结，通过引入关键性反哺要素，助力社区发展建设。

“情感—行为”分析视角下，社区成员依恋情感与营建行为之间的内化反馈作用，应是情感内化累积与营建行为选择之间的交替演进过程。主体的情感层级迁移与实践行为更迭的同步共频，有助于建构一种自我驱动的螺旋循环模式，进而形成创新内生驱动机制。以参与人数占比最高的在场成员为例，惯

性日常行为不断淡化主体功能依赖的生存动机，最终演化为环境适应下的稳定人地关系。然而，社区成员因受不同因素的影响，易形成差异化的社区认知，引发地方情感的变化。其中，部分成员始终保持初级依赖状态，满足于既有物质条件且缺乏积极行动意愿，只是被动参与必要的营建活动；部分成员形成高层级的身份认同，成为主动追求自我价值实现者而投入社区建设事业；少数成员具备以地方归属和文化认同为核心的根植感，会在面临外部危机时采取保护甚至奉献行为。至于无法与社区保持密切互动的其他营建主体，强烈的情感联结仍然可以引导他们超越物质联系，开展身份认同与乡土情感的空间映射与实践，说明脱嵌于简单物质联系的联结关系具有更强的稳定性与持久性。

#### 4 依恋驱动下乡村社区的营建策略

##### 4.1 厚植依恋情感,重塑乡村空间“地方性”

面对当前现代文化渗透和本土文化延续的博弈困境，我国乡村社区的营建出现了传统自然人文环境的“异化”现象<sup>[25][31]</sup>，反映了社区主体对乡土价值的误判和对地方情感的误读。作为日常实践形成的“地方”场域，社区空间已然转化为承载记忆及情感的实体符号。因此，新时期的社区营建活动应重视其成员价值取向与情感诉求的空间转译，创造兼具本土地方意义和现代生活需求的人居环境。

换言之，生活场域是本土地方性的核心载体，重塑社区共同体应维护空间本真性，避免突兀的“现代性”植入<sup>[37]</sup>。一方面，坚持保护成员感知强烈的生产生活空间，将承载地域主体生存哲学与社会意义的历史遗留视为维系高层次依恋情感的重要符号纽带。另一方面，坚持静态地方性要素与居民日常活动有机融合，创造一种更为鲜活的“乡土景观”，不断推进地方性意义再生产。而伴随广泛的集体参与和社会交往，社区空间的社会属性由成员之间互助合作、权益共享的依存关系形成，更加适应我国乡村固有的集体特征<sup>[38]</sup>。

##### 4.2 利用尺度差异,整合社区发展条件

现阶段，城乡系统之间的互动与融合日益加剧，破除乡村社区发展的时空约束，加快发展要素的双向流动，对建构社区转型发展的长效机制愈发重要。而利用尺度差异下依恋情感与营建行为之间的互动规律，活化不同时空的禀赋条件与发展资源，有益于激发乡村发展活力，实现“再本土化”转型。

首先，以“社区归属”为目标，完善社区生计保障功能。重点以保障村民发展权为导向，采取开发闲置低效用地、完善公共服务设施配套等举措，持续改善乡村人居环境，满足成员基本的物质经济依赖。其次，开展“地方认同”的社会建构，延存社区自然人文资源。通过积极组织成员参与地域性要素的创造性转化，巩固“我者”身份归属与价值认同。最后，发挥“乡土情结”的纽带作用，引导城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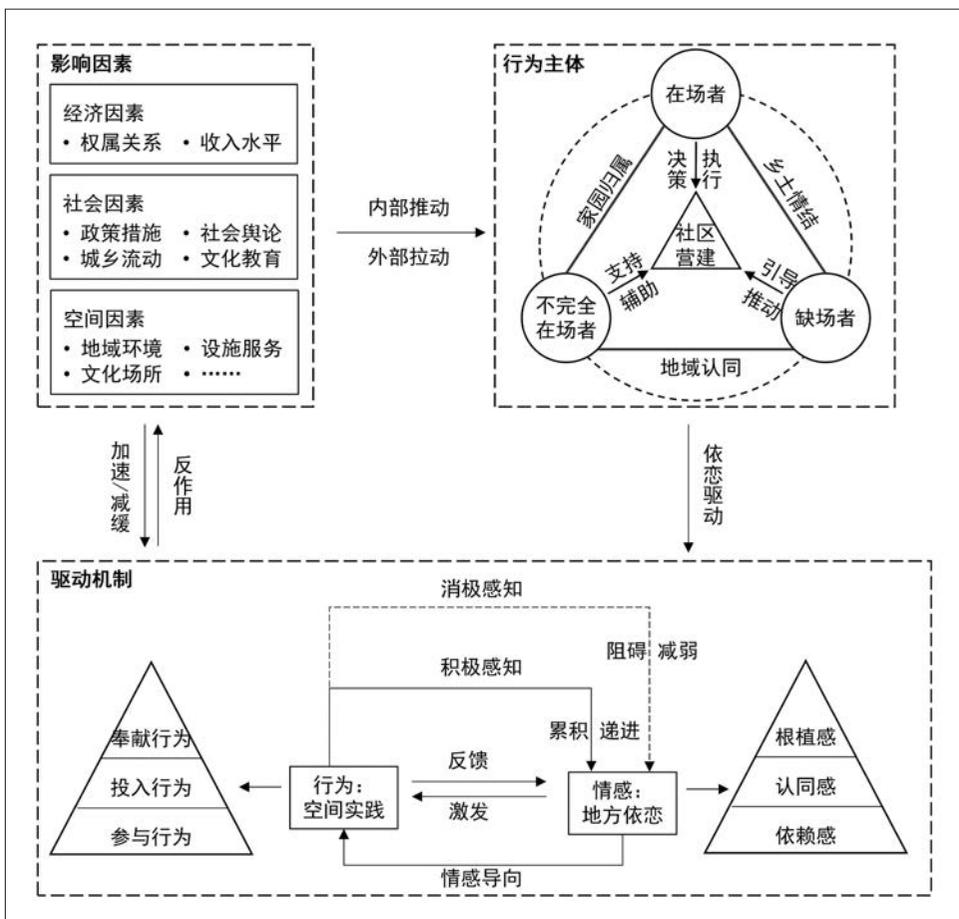


图3 地方依恋视角下社区营建的机制框架

Fig.3 Mechanism framework of community construc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place attachment

资料来源:笔者自绘。

要素双向流动。善于借助各类传播媒介,广泛唤醒大众的乡土情结,以求持续引导外部要素回流,真正形成长效反哺机制。但需要注意,营建过程中要素整合应注重价值取舍,坚持尊重成员的情感诉求和价值共识,避免社区丧失主体地位和遗失乡土特征。

### 4.3 挖掘情感共识,建构行动主体网络

如何协调多元主体的利益诉求,将异质行为统一于共同目标的组织行动,始终是社区营建的关键问题<sup>[39]</sup>。如图4所示,新一轮的社区营建应围绕主体的价值认同与情感归属建构“共识枢纽”,按照“问题界定—合作沟通—权责共享—效益感知”的转化过程,促成抽象情感共识向地方发展共识转译,动态建构社区营建的行动主体网络。具体而言,应结合情感差异下的价值认知与利益诉求,由问题导向归纳不同行动目标与组织框架。进而,通过具体实践活动,不断完善平等的对话体系与有序的行动结构,促进主体间发展权力与责任共享。充分沟通合作将有效缩小主体之间的价值认知差距,及时调整各自的利益诉求,进一步增强各方主体对“共识枢纽”的广泛认同。而且伴随着营建过程中感知内容与情感状态的变化,主体将自发评估营建的社会经济效能,更新自身的价值认知与目标诉求,推动新一轮“共识枢纽”的建构与演进。

### 4.4 标绘依恋空间,提升营建活动效能

伴随着依恋情感的建构,社区空间将被赋予重要的人文内涵,由单纯的地理空间转变为有意义的地方。社区主体则依据功能需求与价值判断,对物质空间形成由生存依赖到情感归属的多层级、差异化的感知与定位<sup>[40]</sup>。目前,部分学者已利用空间图示语言,“标绘”(mapping)人地情感的量化强度与质性意义,厘清物质环境与其承载的社会意义之间的空间关系,以此辅助乡村社区营建的决策与实施<sup>[41]</sup>。

因此,建议乡村社区营建可以考虑利用

物质要素与情感认知之间的关联性,建构村镇社区的“空间—情感”数据集,定量测度情感的类型、层级、强度等分布特征,解构乡村社区的情感地图(见图5)。上述分析结果可用于挖掘社区空间承载的社会情感意义,追踪乡村社区物质空间更新过程中的情感轨迹。比如,规划前期通过识别空间类型和情感层级,合理制定风貌保护方案;或在实施后期,动态评估社区主体对空间更新的评价反馈。针对性的营建策略将促成依赖空间的功能保障、认同空间的品质提升和根植空间的保护传承,减少规划实践的决策偏差,提升营建活动的效能。

## 5 结语

面对当前显著的社会经济转型与空间重构,广大村庄亟需整合内外资源和创造发展条件,同时也要避免主体性不足产生的内生动力衰弱等不可持续问题。本文尝试引入地方依恋理论,结合理论综述,归纳相关概念的发展过

程和依恋情感的建构机制,厘清主体情感对空间实践的内生驱动作用与社会建构意义,以及不同依恋情感影响下营建行为的选择差异。情感产生自特定的社会实践,附着于具体的物质空间,是空间与自我身份的重要纽带。主体与依恋空间产生互动联系,一方面是认知自我、界定身份的个体活动,另一方面也在空间互动中产生积极情感输出,推动以情感营建为导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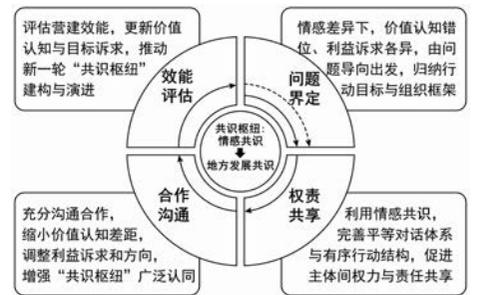


图4 基于“情感共识”的乡村社区营建行动主体网络建构机制  
Fig.4 Construction mechanism of action subject network of rural community based on "emotional consensus"  
资料来源:笔者自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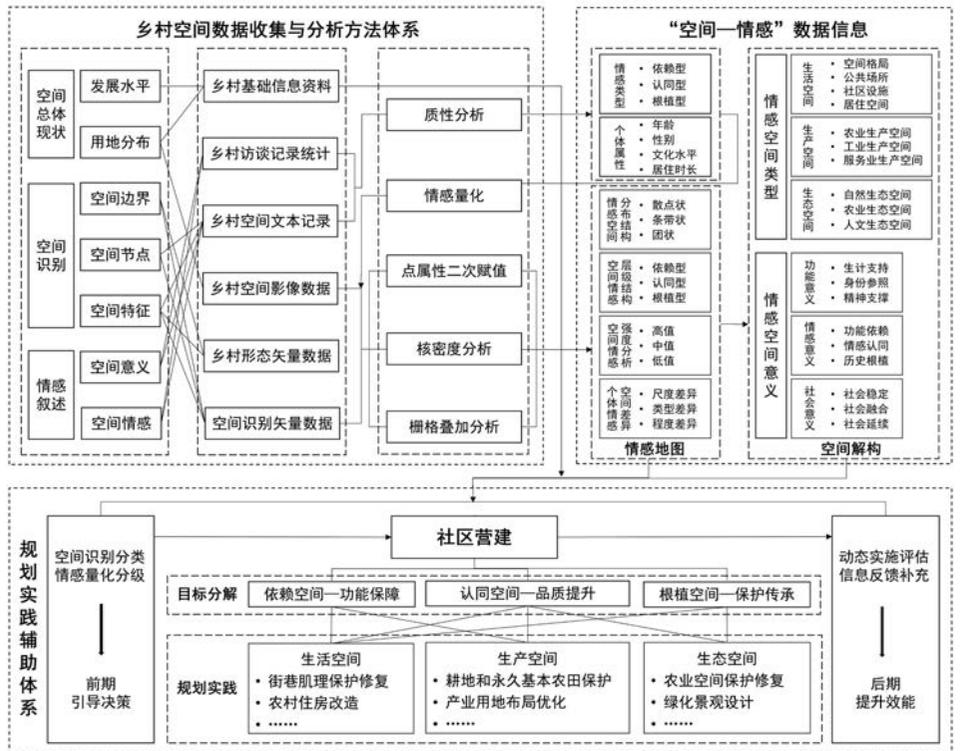


图5 乡村空间情感数据平台建构与决策辅助技术框架  
Fig.5 Construction of rural spatial emotional data platform and technology framework of decision support  
资料来源:笔者自绘。

的社区营建进程。在这一过程中,依恋感由依赖感、认同感甚至根植感交融而成,复杂情感驱动营建行为,同时又在行为反馈中变化情感轨迹。而当地方情感与自我价值相互映照,对自我的追求会投射于社区集体发展,社区主体在集体参与中巩固自我身份与价值认同,以地方依恋凝聚社区情感共同体。

社区营建实质是以空间营建为载体,实现主体行为表达、身份建构与价值追求的实践过程。乡村社区营建应突破传统物质空间建设的局限,积极运用依恋情感的内驱作用,发挥集体性实践的溢出效应,营造乡村友好的社会情感氛围。在“情感—行为”的交互作用逻辑下,乡村主体与社区之间缔结的尺度叠合、层级互嵌的情感联系,将成为组织地方营建的主线。跨时空参与下的社区资源整合,基于情感共识建构的行动主体网络,以及专业性更强的情感评估方法等策略,均可视为情感诉求的空间转译。而在此过程中,主体情感培育与行为选择之间的互馈循环,将有助于弥合现代化进程导致的客观城乡差距,扭转社会层面长期对乡村地域的消极认知,重拾新时期乡村的本源价值与人居功能。

伴随着全球化和都市化浪潮的冲击,乡村地区出现了地方性消解危机,应重视挖掘隐于社区成员内心的地方情感,建构驱动其参与社区营建的内生动力,利用人地关系的良性互动,重构承载“三生”功能的社区共同体。上述研究与讨论主要尝试在理论层面建构地方依恋理论的本土化分析视角与框架,拓展既有社区营建机制研究的情感维度与逻辑。如何延伸普适性的理论分析,建构适应乡村社区空间情感评价与分析技术方法,有效指导具体的规划实践应是后续研究的重点。

## 参考文献 References

- and rural revitalization in the new era in China[J]. *Acta Geographica Sinica*, 2018, 73(4): 637-650.
- [2] 张海鹏, 郗亮亮, 闫坤. 乡村振兴战略思想的理论渊源、主要创新和实现路径[J]. *中国农村经济*, 2018 (11): 2-16.
- ZHANG Haipeng, GAO Liangliang, YAN Kun. Strategic thinking on rural revitalization strategy: theoretical origin, main innovation and realization path[J]. *Chinese Rural Economy*, 2018(11): 2-16.
- [3] TUAN Y. Topophilia: a study of environmental perception, attitudes, and values[M]. Englewood Cliffs, N.J.: Prentice-Hall, 1974.
- [4] SHUMAKER S, TAYLOR R B. Toward a clarification of people-place relationships: a model of attachment to place[M]//SHUMAKER S. *Environmental psychology: directions and perspectives*. Thousand Oaks: Sage Publications, 1983.
- [5] TUAN Y F. *Space and place: the perspective of experience*[M].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1977.
- [6] BOWLBY J. Separation anxiety[J]. *The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Psychoanalysis*, 1960, 41(1): 89-113.
- [7] HIDALGO M C, HERNANDEZ B. Place attachment: conceptual and empirical questions[J]. *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Psychology*, 2001, 21(3): 273-281.
- [8] LOW S M, ALTMAN I. Place attachment: a conceptual inquiry[J]. *Human Behavior & Environment: Advances in Theory & Research*, 1992, 12: 1-12.
- [9] WILLIAMS D R, ROGGENBUCK J W. Measuring place attachment: some preliminary results[C]//NRPA Symposium on Leisure Research, San Antonio, TX, 1989.
- [10] STOKOLS D. People in places: a transactional view of settings[R]//UC Irvine previously published works: cognition, social behavior, and the environment, 1981: 441-488.
- [11] PROSHANSKY H M. The city and self-identity[J]. *Environment & Behavior*, 1978, 10(2): 147-169.
- [12] 黄向, 保继刚, Wall Geoffrey. 场所依赖: 一种游憩行为现象的研究框架[J]. *旅游学刊*, 2006 (9): 19-24.
- HUANG Xiang, BAO Jigang, GEOFFREY W. Place attachment: a conceptual framework for understanding recreational behavior[J]. *Tourism Tribune*, 2006(9): 19-24.
- [13] 谢涑湘, 谭俊杰, 常江. 广州市老城区老年人及青壮年的社区依恋异同研究[J]. *城市发展研究*, 2019, 26 (5): 16-21.
- XIE Dixiang, TAN Junjie, CHANG Jiang. Study on the similarities and differences of community attachment between the elder and the young in old urban areas of Guangzhou[J]. *Urban Development Studies*, 2019, 26(5): 16-21.
- [14] 余志远, 赵星会, 梁春媚. 社区旅游参与视角下民族村寨旅游地居民地方感生成[J]. *旅游导刊*, 2021 (1): 23-42.
- YU Zhiyuan, ZHAO Xinghui, LIANG Chunmei. The formation of residents' sense of place in ethnic village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ommunity tourism participation[J]. *Tourism and Hospitality Prospects*, 2021(1): 23-42.
- [15] MCHUGH K E, MINGS R C. The circle of migration: attachment to place in aging[J]. *Annals of the Association of American Geographers*, 1996, 86(3): 530-550.
- [16] KALTENBORN B R P, WILLIAMS D R. The meaning of place: attachments to Femundsmarka National Park, Norway, among tourists and locals[J]. *Norsk Geografisk Tidsskrift Norwegian Journal of Geography*, 2002, 56(3): 189-198.
- [17] SEAMON D. Body-subject, time-space routines, and place ballets[M]//BUTTIMER A, SEAMON D. *The human experience of space and place*. London: Croom Helm Ltd. 1980.
- [18] SCANNELL L, GIFFORD R. Defining place attachment: a tripartite organizing framework[J]. *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Psychology*, 2010, 30(1): 1-10.
- [19] MORGAN P. Towards a developmental theory of place attachment[J]. *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Psychology*, 2010, 30(1): 11-22.
- [20] 吴悦芳, 徐红罡. 季节性退休流动者“家”的地方依恋——以三亚为例[J]. *人文地理*, 2019, 34 (5): 62-68.
- WU Yuefang, XU Honggang. Home place attachment for the seasonal retirement migrants: a case study of Sanya[J]. *Human Geography*, 2019, 34(5): 62-68.
- [21] 张骁鸣, 翁佳茗. 从“地方感”到“人地相处”——以广州天河体育中心公共休闲空间中的人地关系为例[J]. *地理研究*, 2019, 38 (7): 1581-1593.
- ZHANG Xiaoming, WENG Jiaming. From "sense of place" to "human-place association": a human-place relationship in the Guangzhou Tianhe Sports Center public leisure space[J]. *Geographical Research*, 2019, 38(7): 1581-1593.
- [22] BROWN B, PERKINS D D, BROWN G. Place attachment in a revitalizing neighborhood: individual and block levels of analysis[J]. *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Psychology*, 2003, 23(3): 259-271.
- [23] MISHRA S, MAZUMDAR S, SUAR D. Place attachment and flood preparedness[J]. *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Psychology*, 2010, 30(2): 187-197.
- [24] FRIED M. Residential attachment: sources of residential and community satisfaction[J]. *Journal of Social Issues*, 2010, 38(3): 107-119.
- [25] 冯悦, 王凯平, 张云路, 等. 乡村公共空间与场所依恋研究综述: 概念、逻辑与关联[J]. *中国园林*, 2021, 37 (2): 31-36.

- FENG Yue, WANG Kaiping, ZHANG Yunlu, et al. An overview of research on rural public wpace and place attachment: concepts, logics, and associations[J]. *Chinese Landscape Architecture*, 2021, 37(2): 31-36.
- [26] 董慰, 姜健坤, 董禹. 社区可步行性对老年人地方依恋及就地养老意愿影响研究——以哈尔滨市香坊老工业区为例[J]. *上海城市规划*, 2020(6): 30-35.
- DONG Wei, LOU Jiankun, DONG Yu. Impact of community walkability on the elderly's place attachment and willingness to aging in place: an empirical study of Xiangfang Old Industrial Zone in Harbin[J]. *Shanghai Urban Planning Review*, 2020(6): 30-35.
- [27] SCHULTZ P W, TABANICO J. Self, identity, and the natural environment: exploring implicit connections with nature[J]. *Journal of Applied Social Psychology*, 2007, 37(6): 1219-1247.
- [28] 钱莉莉, 张捷, 郑春晖, 等. 灾难地居民集体记忆、地方认同、地方保护意愿关系研究——以汶川地震北川老县城为例[J]. *地理研究*, 2019, 38(4): 988-1002.
- QIAN Lili, ZHANG Jie, ZHENG Chunhui, et al. The relationships among post-disaster collective memory, place identity and place protection intention of local residents: a case study of Wenchuan earthquake ruined town of Beichuan[J]. *Geographical Research*, 2019, 38(4): 988-1002.
- [29] GUSTAFSON P. Mobility and territorial belonging[J]. *Environment and Behavior*, 2009, 41(4): 490-508.
- [30] 孟令敏, 赵振斌, 张建荣. 历史街区居民地方依恋与制图分析——以商南西街为例[J]. *干旱区资源与环境*, 2018, 32(11): 106-113.
- MENG Lingmin, ZHAO Zhenbin, ZHANG Jianrong. Place attachment of urban historic district residents and mapping analysis: case of Shangnan West Street District[J]. *Journal of Arid Land Resources and Environment*, 2018, 32(11): 106-113.
- [31] 吴蓉, 黄旭, 刘晔, 等. 地方依恋对城市居民社区参与的影响研究——以广州为例[J]. *地理科学*, 2019, 39(5): 734-741.
- WU Rong, HUANG Xu, LIU Ye, et al. The effect of place attachment on urban residents' civic engagement: the case of Guangzhou City[J]. *Scientia Geographica Sinica*, 2019, 39(5): 734-741.
- [32] 费孝通. 乡土中国[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8.
- FEI Xiaotong. *Earthbound China*[M]. Beijing: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2008.
- [33] 吴丽敏. 文化古镇旅游地居民“情感—行为”特征及其形成机理[D]. 南京: 南京师范大学, 2015.
- WU Limin. The characteristics and formation mechanism of "emotion-behavior" of residents in ancient cultural towns[D]. Nanjing: Nanjing Normal University, 2015.
- [34] 孙九霞, 周一. 遗产旅游地居民的地方认同——“碉乡”符号、记忆与空间[J]. *地理研究*, 2015, 34(12): 2381-2394.
- SUN Jiuxia, ZHOU Yi. Residents' place identity at heritage sites: symbols, memories and space of the "Home of Diaolou"[J]. *Geographical Research*, 2015, 34(12): 2381-2394.
- [35] HAMMITT W E, STEWART W P. Sense of place: a call for construct clarity and management[C]// Sixth International Symposium on Society & Resource Management, 1996.
- [36] 龙花楼, 屠爽爽. 乡村重构的理论认知[J]. *地理科学进展*, 2018, 37(5): 581-590.
- LONG Hualou, TU Shuangshuang. Theoretical thinking of rural restructuring[J]. *Progress in Geography*, 2018, 37(5): 581-590.
- [37] 郭文. 空间意义的叠写与地方认同——中国最后一个原始部落翁丁案例[J]. *地理研究*, 2020, 39(11): 2449-2465.
- GUO Wen. The superscription of spatial meaning and local identity of the last primitive tribe of Wengding Village, China[J]. *Geographical Research*, 2020, 39(11): 2449-2465.
- [38] 王思斌. 乡村全面振兴与乡村集体性的发展[J]. *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1, 58(4): 5-17.
- WANG Sijin. The all-around rural vitalization and the development of rural collectivity[J]. *Journal of Peking University (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s)*, 2021, 58(4): 5-17.
- [39] 姚华松, 邵小文. 中国乡村治理的新视域: 基于现代性与认同互动的角度[J]. *地理科学*, 2020, 40(4): 581-589.
- YAO Huasong, SHAO Xiaowen. A new perspective of China rural governance based on modernity and identity[J]. *Scientia Geographica Sinica*, 2020, 40(4): 581-589.
- [40] JORGENSEN B S, STEDMAN R C. Measuring the spatial component of sense of place: a methodology for research on the spatial dynamics of psychological experiences of places[J]. *Environment and Planning B: Planning and Design*, 2011, 38(5): 795-813.
- [41] 王洋, 于立. 国外“人—地情感”的标绘研究引介: 作为规划决策制定的辅助工具和公众参与途径[J]. *国际城市规划*, 2019, 34(4): 102-110.
- WANG Yang, YU Li. People-place emotion mapping as the instrumental tool for decision-making and approach to public participation in planning: an introduction[J]. *Urban Planning International*, 2019, 34(4): 102-110.